涅槃重生 世界冠军朱雨玲开启多面人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十多天前的2025WTT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上，代表中国澳门队参赛的中国女乒前国手朱雨玲以4:2战胜国家队小师妹陈熠，摘得冠军。在这项云集了世界顶尖乒乓球选手的顶级赛事上，一名退出乒坛3年，重返赛场还不到一年的老将站上最高领奖台，这已经是个不小的奇迹，而在这位老将的身上，还贴有大学副教授、在读博士生等多个身份标签，这更让她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一时间，朱雨玲的夺冠消息引爆网络，她的故事也感动了亿万观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独家连线朱雨玲，请她谈谈过去几年涅槃重生的心路历程。

7月14日，朱雨玲在2025WTT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捧起冠军奖杯。 视觉中国供图

竞技梦想的戛然而止

2020年8月，中国乒乓球队举行的奥运模拟赛上，朱雨玲突然缺席，当时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李隼对外界表示，朱雨玲的免疫系统出了状况，医生建议她住院观察治疗。作为2017年女乒世界杯冠军和2017年至2019年乒乓球亚洲杯女单三连冠的朱雨玲，是当时中国乒乓球队内有望拿到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有力竞争者之一，但在如此关键的奥运模拟赛上，朱雨玲的缺席无疑意味着她将大概率失去进军奥运的机会。朱雨玲回忆，“自己当时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退出奥运模拟赛。我当时也清楚，这次退赛基本上等于宣布自己无法参加来年的东京奥运会了。”

此时，医生已经建议朱雨玲做手术，但她采取了保守治疗，还在坚持训练和比赛，“当时觉得自己年轻，没有把这个病太当回事”。朱雨玲说，“而且，虽然已经无缘奥运，但我还是准备参加2021年全运会的，所以当时的想法是等到完成2021年全运会之后再做进一步治疗。”

2017年全运会上，朱雨玲曾率领四川队夺得了乒乓球女团冠军。4年后，朱雨玲仍希望在全运会赛场上为培养自己的四川省队再拼一届女团冠军。

然而，疾病的恶化速度还是超出了朱雨玲的预料。2021年，当东京奥运会的开幕进入倒计时，朱雨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回忆，“身体的疼痛不仅影响了训练，也开始影响正常的生活，我那时经常在夜里被疼醒”。

再次住进医院，医生的一句“你的这个肿瘤有30%至40%的概率是恶性”彻底惊醒了一直还在把训练和比赛放在首位的朱雨玲。“生命只有一次，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如此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话——健康是1，没有了这个1，再多的0都是浮云。”

手术治疗迫在眉睫，朱雨玲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地中断了自己尚处于巅峰时期的乒乓球职业生涯。但内心的煎熬也越来越强烈，朱雨玲心有余悸地说，“我那时的精神状态已接近崩溃。虽然知道肿瘤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但我必须做好面对最坏结果的准备。直到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仍然后怕。”

2021年9月，朱雨玲进行了手术。她回忆，“手术完成后我从麻醉中醒来，当医生告诉我‘肿瘤是良性的’，一股欣喜瞬间涌上心头”。朱雨玲说，“那一刻的感觉就是，我重获了新生”。

当人生变为多线程

手术之后，朱雨玲的身体逐渐康复，但医生叮嘱，手术后的静养需要至少半年，所以朱雨玲暂时搁置了重返赛场的计划。

朱雨玲感谢多年的运动员生涯磨炼了自己的勇气，这是自己能够战胜病魔的重要因素之一，“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运动员夺得冠军的荣耀时刻，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夺得一次冠军之前，我们可能要经历100次失败。因为经历过太多的挫折和艰难，所以练就了我们更强的抗挫折能力和直面困难的勇气。在我遭遇人生如此重大变故的时候，是这样的勇气支持着我，让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这场大病，也让朱雨玲知道了有些东西比乒乓球更重要。朱雨玲说，大病之前，自己的人生是单线程的，乒乓球就是全部。重生之后，她决定去拥抱更丰富多彩的生命，她认为人生应该是多线程的。

“我在打球的时候就很想重回学校，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提升文化知识素养。这场大病让这一梦想提前实现了。我在病愈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学校。”朱雨玲说。

2022年，朱雨玲申请进入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我以前觉得，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可能就是打乒乓球了。转换身份之后才发现，原来打乒乓球是最容易的。”朱雨玲幽默地说道，“自己敢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大概也是因为无知者无畏”。

但正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让朱雨玲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进而更加努力地提高自我。“我在学校里遇到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与他们的交流不可能只谈乒乓球，所以我要学习更多知识、要关注行业趋势和各种新闻。这3年来，我的知识面有了很大的拓宽，接触到的人也不再是以运动员为主。”

在这3年里，朱雨玲的导师一次次鼓励她，“你是一名被乒乓球耽误的好学生”。起初，朱雨玲对导师的这番话感到有些惊讶，但之后她终于理解了导师的用意，“导师是想告诉我，我最擅长的乒乓球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的人生具有无限可能性”。

如果一切顺利，朱雨玲将在明年五六月完成博士论文，拿下博士学位。在朱雨玲看来，4年的读博时光，自己最大的收获不是一张文凭，而是这段学习经历。

2023年，朱雨玲入职天津大学，担任体育部副教授。

成为一名大学体育教师之后，朱雨玲发现，原来教普通学生打乒乓球最难的是沟通。“就比如教练发出‘向前’这个指令，我们作为专业运动员能自己判断是指重心向前还是挥拍向前，抑或是其他选项，但普通学生会很迷茫，这个向前是往哪个方向、需要多大幅度。如果这些他们不清楚，他们就做不好动作，甚至会很紧张。”

朱雨玲在与学生反复沟通交流之后，终于掌握了普通学生能听懂的乒乓球语言，同样是“向前”这个指令，她现在大概会跟学生这么说，“迈向左斜前方45度，距离球台20公分”。这样的教学方法起初也让朱雨玲觉得有点不适应，但这却是普通学生最容易理解和执行的话术。

作为一名大学体育教师，朱雨玲也在校园切身体会到了现在乒乓球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关注乒乓球、参与乒乓球运动的大学生太多了。“学校的乒乓球台总是供不应求，”朱雨玲说，“我也在与学生们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虽然打乒乓球的学生很多，但是赛事太少，以前每年就只有一个‘新生杯’的比赛。而比赛是体育运动的最大魅力所在，练球不就是为了比吗？所以我与学校协商，组织了以学院为单位的天津大学校内乒乓球联赛。通过比赛，可以更好地调动大家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积极性，也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为荣誉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

人生的舞台不止于赛场

2024年2月，朱雨玲通过澳门特区政府的人才引进计划获得了澳门居民身份。朱雨玲说：“这个身份并不强制必须一直人在澳门，所以不影响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我也没有想过要在澳门重返乒乓球赛场。”

2024年9月，澳门要举办WTT世界乒联澳门冠军赛，澳门方面提议已经拿到澳门身份的朱雨玲作为东道主选手参加比赛，这也是对澳门乒乓球的一个展示和推动。朱雨玲回忆，自己当时其实很犹豫，因为之前从未考虑过在澳门复出，但思考之后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重回赛场，“因为一场大病，我的乒乓球运动员生涯中断得非常突然，就那样草草结束怎能没有遗憾？所以，我在澳门复出，也是因为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弥补这个遗憾，与乒乓球做一次真正的告别。我到那时会为人生的这一重要时刻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我的学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他们积极地支持我复出，我也希望我能在赛场上成为他们的荣耀。”

只是没想到，这个荣耀来得如此之快。北京时间7月14日的WTT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现场，朱雨玲在复出后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这一WTT世界乒联最高级别的赛事问鼎冠军，世界排名也跻身到了第6位。

朱雨玲坦言，“我做梦都不敢想象夺得这个冠军”。“相比起参加比赛的很多选手，我的技术没有她们先进，训练时间没有她们长，参加大满贯比赛的经验也不如她们多。我实在想不出自己夺冠的原因。”朱雨玲说，“也可能是我的心态更好，我渴望获得比赛的胜利，并为此竭尽全力，但比赛的任何结果我都可以接受”。

朱雨玲的夺冠引发了全国轰动，她的手机被祝贺的信息挤爆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赞美，朱雨玲说出了一句非常符合教授身份的话，“要辩证地看待”。

如今的朱雨玲，是乒乓球运动员，也是大学副教授，还是在读博士生。“乒乓球已经不是我的全部”，朱雨玲说，“我该带的课并不会因为我拿了冠军而减少一节，我该写的博士论文也不会因为我拿了冠军就可以少写一个字。乒乓球只是我现在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外界怎么评价我，我都不会受到影响。我只做真实的自己，走好自己的路。”

有人说，看着朱雨玲的竞技状态向好，甚至有重回巅峰的可能，但因为中国澳门队不具备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作为澳门队一员的朱雨玲也就不可能再站到奥运会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会不会成为她的又一个遗憾？朱雨玲笑着说：“最高的舞台这几个字是需要打上引号的，因为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奥运会确实可能是最高舞台，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人生的舞台已不止于此。”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

新国足十月邀请赛吹响集结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梓昂
记者 郭 剑

上周末，新帅邵佳一统领青岛西海岸在上海海港主场用一场2:2平局赢得尊重，半程冠军北京国安则在成都败阵而归几乎掉出争冠集团，保级区青岛海牛大发神威主场力擒津门虎总算赢得喘息之机——就在中超联赛竞争愈发激烈之际，让球迷始终牵肠挂肚的国足也悄然开启选帅流程，多位候选人资料已经传至中国足协相关部门。

7月25日，中国足协官网刊发《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征集2025下半年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承办赛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面向会员协会征集今年下半年各支“国字号”队伍新一轮国际邀请赛的承办意向。

《通知》表示，“根据中国足协各级国字号队伍最新竞训安排，中国足协拟于2025年下半年在原赛事计划的基础上更新国际足球邀请赛办赛计划”，将于今年10月至11月分别举行2至4支队伍参加的国家男足邀请赛、4支队伍参加的U22国家男足邀请赛和参赛规模同样为4支队伍的U18国家男足邀请赛。

根据《通知》表述，新国足将于10月6日至14日，以及11月10日至18日（包含国际足联10月和11月两个国际比赛日）参加邀请赛，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由于10月邀请赛大概率有“国足新帅首秀”概念加持，申办赛区对此极感兴趣。

除去7月上旬临时带队征战东亚杯赛的久尔杰维奇，前任国足主帅伊万科维奇在球队败走2026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8强赛后被中国足协“结束合同”，毕竟教练排兵布阵不当、临场指挥欠佳，是国足在关键战役当中“屡战屡败”的诸多因素之一。伊万科维奇2024年2月上任，取代同年1月卡塔尔亚洲杯赛表现不佳的前主帅扬科维奇，结果3月伊万科维奇首秀便在36强赛中客场2:2与新加坡战平，到6月主场被泰国逼平，球迷苦涩感觉不断加深。36强赛死里逃生进入18强赛，国足10场小组赛前9场2胜7负提前一轮出局，伊万科维奇“下课”命运已经注定。

2015年国足前往澳大利亚征战亚洲杯赛小组三连胜昂首出线，由时任主教练佩兰起算至今10年国足已换9任主帅，其中任期最长的意大利名帅里皮，先后两期相加3年有余，其次李铁两年有余，再次佩兰将近两年——国字号球队换帅频繁程度堪比俱乐部球队，战术风格的稳定性及整体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在最初的国字号备战计划当中，国足9月便有热身赛要打，但《通知》明确国足9月热身赛取消，原因不外有三：第一，为保证U23亚洲杯预选赛备战的完整性，王钰栋、蒯纪闻、刘诚宇等国脚都在备选名单当中，自然无法跟随国足参加9月邀请赛；第二，9月上旬中超联赛难得10天假期，联赛收官阶段国足组织集训热身赛效果不难想象；第三，国足新主帅9月未必到位，再找临时主帅带队参加邀请赛更无意义。

U23亚洲杯预选赛9月开赛，U23国足与澳大利亚、东帝汶、北马里亚纳群岛同处D组。按照赛制规则，11个小组第一名及4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能够出线，晋级2026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U23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国足所处D组赛事在西安举行，出线难度并不大。

因此国足选择9月“空窗”在情理之中，而留出9月富裕时间也恰可为这一届国足新帅上任做好铺垫。

此次中国足协选帅程序将先选外籍技术总监，再由技术总监牵头负责选帅事宜，相较于此前由多位相关人员“协调”负责选帅的过程，这样的做法至少可以在技术层面增加针对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与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铩羽而归的国足相比，备战2030六国世界杯（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只举办前3场比赛，其余比赛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举行）的新周期内，国足年龄结构将更加合理：已在中超联赛赢得高度认可的王钰栋、刘诚宇均为06年龄段球员，搭配01年龄段球员谢文能，2000年龄段朱辰杰、蒋圣龙，98年龄段球员高天意，97年龄段球员张玉宁，粗略一算，国足前中后3条阵线基本框架已有——这份优质“见面礼”对于新帅而言，再实用不过。

用有限预算锁定正常性价比主帅，与技战术层面的选择相辅相成。综合历届冲击世界杯之路的经验与教训，国足主帅所承担的责任应有明确范围，只是中国足协继续扩大“放权”范围能力同样有限。“经济实惠”“年富力强”“理念先进”“训练严格”“擅于沟通”“了解亚洲足球”等理想中的选帅标准，究竟能为中国足球带来一位怎样的教练不得而知，不过寄希望于世界杯决赛圈由48支球队再次扩军至64支球队、亚洲区名额增至16个，“稀释”后的世界杯也不再会像如今一样迷人了。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

7月27日，2025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8轮比赛，青岛海牛队主场2:0战胜天津津门虎队。图为青岛海牛队球员尼古拉（左）与天津津门虎队球员杨梓豪拼抢。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如何用体育为特殊儿童打开成长之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实习生 张智超

“教会特殊儿童运动的成就感不亚于拿金牌，这也是退役运动员的价值所在。”中国冬奥首金得主、冠军基金发起人杨扬的话，道出了众多退役运动员投身特殊儿童体育教育的心声。

日前，由冠军基金联合全国22个运动员创业体育俱乐部及公益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运动无碍，融合有爱”——特殊儿童体育友好倡议书》正式发布。该倡议以接纳、平等、尊重为核心，呼吁体育行业企事业单位和个体携手打造特殊儿童体育友好环境与服务。与此同时，冠军基金第二期特殊儿童运动指导师培训班正在北京二七冰雪基地授课，5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特教学校老师、教练、特教机构从业者及家长齐聚一堂，通过专业平台聚焦特殊儿童的体育需求。

杨扬表示，我国特殊儿童数量庞大，但受限于专业指导稀缺、接纳环境不足及社会认知有限等问题，其体育参与率长期处于低位。在此背景下，推动包括运动员在内的体育人投身特殊儿童体育事业，培养“懂体育也懂特殊儿童”的专业队伍，不仅为运动员开拓了职业新赛道，更让体育的社会价值在公益实践中持续绽放。

马琦带领新疆残疾人体育协会星光篮球队队员进行训练。 马 琦/供图

新疆残疾人体育协会星光足球队队员在进行训练。 马 琦/供图

在赛场上平等地展示自己

“特殊儿童包括但不限于孤独症儿童，还有其他心智障碍儿童。”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燕丹点明了这一群体的广泛性。根据国内首次基于全国多中心的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病率研究估算，我国6–12岁儿童ASD患病人数约为70万–100万，37%的ASD儿童有智力障碍。庞大的特殊儿童群体常面临被抛弃、封闭隔离等艰难处境，很少有家庭注意到运动这把能撬动命运齿轮的钥匙。

研究表明，运动对特殊儿童的认知、社交、语言理解等九大干预内容均有显著作用。但吴燕丹发现，和10年前推广适应性体育相比，她最常遇到的问题依然是：“特奥和残奥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残疾人奥林匹克涵盖肢体、视觉及部分轻微智力障碍等不同残障群体，特殊奥林匹克主要面向智力障碍人群，强调“勇敢尝试 争取胜利”。因此，吴燕丹建议，足球、篮球、跑步等安全性高、门槛较低的运动更适合特殊儿童，而拳击、击剑等竞技性较强的项目需谨慎评估安全风险。

“特殊奥林匹克的核心是用体育让世界变得更包容。”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代表提及特奥会标志上有3组手臂的人形标志，“从下到上的3组手臂象征特殊人群的3个阶段，即最初的自卑、受排斥，到接触特奥后逐渐自信，最后通过体育获得勇气和尊严”。

中国特奥运动员贾思蕊经历过这般蜕变。小时候，她因智力障碍在普通学校遭受排挤与歧视，进入培智学校后，她的体操天赋被发现，“训练很辛苦，但我能察觉到自己的改变，比如越来越有勇气面对挫折”。1999年第十届特殊奥林匹克世界夏季运动会上，贾思蕊夺得平衡木冠军，“赛场上，我不会被轻视也不会被刻意优待，我能平等地展示自己”。至今回望，最令她有成就的时刻并非站上领奖台，而是获得父母“认可”的时候。

新疆残疾人体育协会星光球队发起人马琦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孩子5岁半时被确诊，我都不知道孤独症是什么。”马琦回忆，直到医生告知“这是无法完全治愈的终身性疾病”，她才感觉“天塌了”。

马琦不甘心，带孩子辗转全国求医，寻找康复的可能，最终在体育中找到突破口。“看他第一次挥起乒乓球拍，我忍不住哭了。”马琦说，经过8年坚持，现在儿子已经能达到常规水平，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情绪、睡眠、自理能力得到全方位改善，“从最初的情绪失控、满场疯跑，到现在他能独自参加夏令营，包揽所有家务，甚至成为我的训练助教”。

看到儿子的变化，马琦萌生了帮助更多家庭的想法。2022年，她捡起体育特长成立星光球队，带领20名特殊队员参与篮球、足球项目。“有的孩子刚来时情绪激动，稍不如意就咬人、打人，如今已能克制冲动，哪怕只完成一组动作也不再乱跑。”她成为孩子们的“队友”，也收获了最纯粹的回馈，“他们会把器材摆放得整整齐齐，上课纪律甚至超过健全的孩子”。如今，团队中已有8名队员具备参加融合比赛的能力，她迫切地寻找参赛机会，“希望更多人看到，特殊儿童不是负担，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

平等又不平等的处境

组建一支“特殊球队”并不容易，场地就是最现实的问题。马琦记得，起初，普通青训营常以额外付费或直接拒绝的方式将他们拒之门外，在公共健身场所，孩子偶尔失控的笑声或不协调的肢体动作，不仅会招致“像看马戏猴一样”的眼神，还会被路人拍下放到网上“指指点点”，最终，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球队才申请到免费的专用场地训练。

“国家一直重视特殊教育，近年来持续推出多项政策，但基层落地情况和政策要求仍存在落差。”吴燕丹认为，特殊儿童的“平等”需以“不平等”为前提，“若仅给予与健全孩子相同的课程和关怀，他们可能难以适应，必须向他们倾斜更多资源和专业支持，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但目前仍缺乏自上而下的支持系统，“特殊儿童运动康复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运动功能评估缺失、体育送教资源匮乏以及专业指导严重不足”。她强调，专业人才稀缺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据吴燕丹介绍，当前特教与体育专业培养“各自为政”，跨学科人才凤毛麟角，许多特教教师对“带孩子运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当越来越多退役运动员有意加入特教工作就成为积极信号，“很多运动员有影响力，如果他们能身体力行地去示范和教学，带动效果不可小觑。同时他们具备专业运动能力，会比其他背景的参与者更易掌握指导核心”。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代表也提到增加专业人才的必要性。据介绍，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智力障碍程度较轻的孩子正脱离特殊教育学校、融入主流社会，而对特校招收的日趋重度障碍的孩子进行运动干预则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才，“孩子们接受运动干预越来越难，尤其离校后，接触特奥的机会就更少了”。对于在普校的轻度智力障碍学生而言，“他们本可通过特奥会塑造领导力，提升融入社会的能力，成为推广特奥的代表，但很多人徘徊在主流社会中害怕被‘贴标签’而错失支持资源”。因此，如何引导他们转变态度、接受支持，同时延续其社会价值，是当前特奥工作的关键课题。

“为智力障碍群体提供运动支持需要多方协作。”目前，特奥组织正与基层体育和家长组织合作，整合资源与理念，填补学校与社区间的服务空白，这个过程中，退役运动员等专业人士的参与至关重要，“他们既能延续自身价值，又能为基层提供专业运动指导，有助于共同构建可持续的支持体系”。

用热情和理性建立对话

在特殊儿童体育教育领域，专业融合与认知转变成为关键议题。杨扬呼吁，更多体育场馆、俱乐部向特殊儿童开放，更多退役运动员转换思维，参与特教工作发掘自我价值，“首先要敞开大门，用包容的心接纳他们”。

“运动员加入我们首先要摒弃竞技体育思维。”马琦表示，曾有专业教练参与带队，但很快就因无法适应而离开，“孩子们运动能力较差，学习一个基本动作比健全孩子慢很多，而且他们喜欢以肢体碰撞进行‘情感链接’，用拍、打等方式博取关注，如果接受不了特殊人群的特性，就算世界冠军也无法坚持”。

“仅凭热情远远不够。”从事特殊教育研究20余年，吴燕丹也曾因代入感过强陷入焦虑，后经前辈点拨学会“理性研究”与“情感投入”的平衡，她才找到了自己在体育特教发展潮流中的位置，“1000个残疾人有1000种需求，我们得承认短板、保持理性才能持久”。

在前女足运动员刘力豪看来，面对特殊儿童，运动员的执行力和决心比体育专业能力更加重要。作为首届特殊儿童运动指导师培训班的学员，前摔跤运动员黄雅玲与刘力豪等运动员在去年发起“星动计划”，组织专业运动员志愿者为特教学校儿童研发适应性体育课程，“这些课程必须技术门槛低、易普及、注重亲子属性”。刘力豪表示，不仅要靠体育提升孩子的运动意识，更要影响家长的观念，“家长是陪伴特殊儿童时间最长的人，只有他们认识到体育对孩子的重要性，改变才可能发生”。

刘力豪参与研发的趣味足球课程，一度被马琦视为“救命稻草”，可有了教程，家长的认知又成为阻碍：部分家长急于求成，训练两天就期待比赛成果；有的则完全缺席，将孩子托付后便置身事外；有人直言：“练体育能让我孩子找到工作吗？”马琦用视频记录每个孩子的进步，却发现部分家长从未关注这些细节，“这些孩子需要终生陪伴，家长若不改变认知，再好的训练都是徒劳”。她无奈表示，不少家庭因无法坚持而退出。

因此，看到越来越多退役运动员关注特殊儿童，马琦十分感动，“做这行必须放下身段，走进孩子的世界”。她相信，特殊儿童通过体育的积极改变，会推动家庭与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毕竟，人生的冠军终生不退役，体育特教的意义就在于助力每个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冠军”。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